

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之一

战前新马文学 本地意识的 形成与发展

杨松年著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联合出版

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

战前

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杨松年 著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联合出版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 杨松年

出版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印刷 Multiprint Services

初版 2001年2月

国际书号 ISBN 1-879771-49-7

版权所有 © Dep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新马文学本地意识形成与发展的背景	5
第三章	侨民意识浓厚时期的新马华文文学	19
第四章	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的新马华文文学	33
第五章	马来亚地方文学的提倡	85
第六章	侨民意识腾涨时期的新马华文文学	103
第七章	完结篇：战后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发展	167
附 录	与战前新马本地意识课题有关的作品篇目 (选编)	173

第一章

绪论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有长远悠久的历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中国经济的破产、政治与社会的不安定，更促使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闽粤地区的人民纷纷南下，谋求生计。¹ 这些南下的中国人中，当然不乏知识分子，他们也是在极度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南来东南亚。南来后，他们面对陌生的社会环境，自然有种种的感触。面对陌生社会的各种问题，也有他们的看法。他们通过作品，抒发他们的情怀；也通过文学作品，表示他们对解决问题的意见；甚至通过种种的文学实践，期望解决他们心目中的问题，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

这些知识分子从中国南来，对中国有浓厚的感情。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坛的变动，也自然会触发他们的中国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们在南洋居住日久之后，也对南洋产生浓厚的情感。他们关心南洋的社会，关心南洋的民众，也关心南洋的教育、文学、文化等等的问题。

这种对南洋的感情，和对中国时局的关怀，有时是互相冲突着的，有时却可以很好的整合。不过从总体上说，这两种感情，从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层面来看，它们就象时钟的钟摆一样。当这些知识分子初来新马时，他们的中国情怀是强烈的。然而当他们在新马居住一段时日之后，他们的南洋感情就越来越浓烈，浓烈得让他们主张南洋色彩的文学，浓烈得让他们发出马来亚应有其地方文学、应有其地方作家的呼声，浓烈得让他们喊出马来亚文艺要有其独特性的口号。这是钟摆向南洋感情的这一方面的移动。但是当中国时局动乱时，当中国政局出现危机时，他们的中国情怀又

¹ 本书第二章，将集中探讨这些问题。

浓烈起来了。他们写下众多关怀中国的言论，进行众多关怀中国的行动，感情的钟摆遂向中国的一方移动。

新马知识分子这种中国情怀与南洋感情的复杂变化，繁复地交织在他们所经营的文学活动中，他们所发表的言论中，和他们所抒发的文学情感中。在研究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运作，与阅读战前新马华文文学作品时，我深深地被这复杂的变化吸引着。这是我会探讨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

新马知识分子这种中国情怀与南洋感情的复杂的变化，是鲜明地贯串在整个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上的。这个发现，对我的新马文学史探求的工作，有另一方面的启示。

编写一个地区的文学史，不能避免分期叙述的问题。过去将新马华文文学史分期论述的主要研究者是方修先生，他把战前的马华新文学(1920—1942)分为以下四期：

1920年至1925年：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期

1926年至1931年：马华新文学的扩展期

1932年至1936年：马华新文学的低潮期

1937年至1942年：马华新文学的繁盛期²

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法，喜欢以文学发展的盛衰为标准。或者纯粹从量的衡量来区分。他们常以文学发展的初期为萌芽期，中前期为盛，中后期为逆转，后期为衰。这种分期法受到传统发展论的起、承、转、合说的影响极大。然而事物的发展并不是在前则盛，在后为衰的。其间的发展也不一定呈现螺旋的轨迹，或作圆形的图状的。以盛衰为文学史分期就有上述的缺点。方修先生的分期法高于一般盛衰论者，就是他并不一般化的看待这个问题，这可以从他以1932年至1936年为马华新文学的低潮期，而在其

² 参阅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新加坡：世界书局，1975）。又《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新加坡：T. K. Goh, 1978）。

后的1937年至1942年为马华新文学的繁盛期得知。但是他的处理方法基本上还是以盛衰的标准与量的衡量为依据。基于我从新马华文文学理论与创作层面的考察，如上文所说的，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经常纠缠着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消长的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如果能探讨新马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分析它如何与中国意识的冲突、整合，分析它如何与中国意识相消长，而以之为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分期，或许可以更清楚了解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情况。³

七十年代末，当我开始研究新马华文文学时，就被战前作者的中国情怀与南洋感情的混杂、消长深深地吸引着。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更令我深深地感叹这两种感情在战前作者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作用又深深地影响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方面的运作，其中包括文学的出版、文学理论的提倡、文学作品的创作，等等。为此，我尝试以新马增长的中国意识与本地意识的消长变易为标准，进行1919年至1949年新马华文文学的分期工作，完成了《本地意识与新马华文文学：1949年以前新马华文文学分期刍议》一文，发表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出版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第二期中。⁴ 这篇文章曾经引起一些反响。日本学者今富正已就赞同这种分期方式。⁵ 而此后我在叙述新马文学发展时，也一直取用这样的分期做为分析的标准。我的研究生也采用这一标准来论析新马华文文学的问题。⁶

在《本地意识与新马华文文学：1949年以前新马华文文学分期刍议》一文中，我把1919年至1949年的新马华文文学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1919年至1924年：侨民意识浓厚时期

1925年至1926年：南洋色彩萌芽时期

³ 有关我对新马华文文学分期的意见，可参阅杨松年《编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新思考》，陈荣照编《新马华族文史论丛》（新加坡：新社，1999），页13-31。

⁴ 杨松年《本地意识与新马华文文学：1949年以前新马华文文学分期刍议》，《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第二期，新加坡：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1980，页61-70。

⁵ 今富正已《马华文学とその周辺》（东京：东洋大学文学部中国语研究室，1992），页1-118。

⁶ 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327页。

1933年至1933年：南洋色彩提倡时期

1934年至1936年：马来亚地方性提倡时期

1937年至1942年：侨民意识腾涨，本地意识遭受挫折时期

1945年至1949年：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⁷

最近我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研究计划，就是撰写一部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的分期也将以新马作者的中国感情与本地情感的消长状况为标准。因此进一步钻研新马华文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的课题对我来说，是非常迫切需要的。这是我会向新加坡国立大学申请研究经费探讨这一课题的原因。非常谢谢大学当局的支持，使我能完成这项课题的研究，并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从事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的学者很少，更没有什么人探究新马华文文学中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的课题。所以在探究这一课题上，本书非常重视原始材料的收集与分析。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资料，多刊载于华文报章的社论、副刊，以及华文期刊杂志。本书的资料就是

从这些报章与杂志广泛收集而得。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是绪论，说明探讨这一课题的原因，也连带说明取材的范围。第二章探讨新马华人南来的背景与原因，这是探究早期南来华人心态不能避开的问题。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析自1919年至1942年不同时期本地意识的成长状况。不过在分期上，与《本地意识与新马华文文学：1949年以前新马华文文学分期刍议》有些不同：第三章论析1919年至1924年侨民意识浓烈的情形；第四章论析1925年至1933年南洋色彩的萌芽与提倡的状况；第五章论析1934年至1936年马来亚地方文学提倡的情形；第六章分析1937年至1942年侨民意识空前腾涨而本地意识遭受挫折的情况。第七章是总结，说明1942年以后本地意识的增长如何影响此后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

⁷ 同注4。

第二章

新马文学本地意识形成 与发展的背景

新马华人什么时候从中国大量移居新马？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大量移居新马？新马和中国过去的交往情况又是怎么样？新马华人来到新马之后，他们如何从中国感情中，发展出南洋的情愫？这是探讨新马文学本地意识形成时，所须知道的一些背景问题。

第一节 新马与中国交往的情况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早在《汉书·地理志》已有记载：当时中国商船，所经过的国家有：都元国、邑卢没国、谿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国已程不国，等等。¹ 据许云樵《马来亚史》，都元国，即今丁加奴之龙运(dungun)；皮宗国，即今柔佛之香蕉岛(Pulau Pisang)；谿离国，即今暹南的Tanau Seri。据《梁书》，狼牙修国曾于天监十四年(515)遣使阿撒多入贡。² 多数学者肯定狼牙修国在今马来半岛之吉打州及泰国北大年一带。唐代狼牙修仍存在，《旧唐书》、《新唐书》作狼牙修，³ 《续高僧传》作棱加修，《大唐西求高僧传》作郎加戌。至宋则作凌牙斯国。见赵汝适《诸蕃志》。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作龙牙犀角国。《梁书》也记载盘盘国与丹丹国入贡中国事。⁴ 《旧唐书》记载：盘盘国“与狼牙修国为

¹ 见《汉书·地理志》。该书卷二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1671。

² 见《梁书·列传第四十八·诸夷》。该书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页795。

³ 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5271；《新唐书》卷二十二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6300。

⁴ 同注3。

邻”，贞观九年(635)，也“遣使来朝，贡方物”。⁵丹丹国至《新唐书》，作单单国，也于唐乾封、总章年间入献方物。⁶《隋书》记载大业三年(607)，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经过。大业六年(610)，常骏又与赤土国王子那邪迪到中国见隋帝之事。赤土亦为马来亚之一大国。⁷宋陈元靓《岛夷杂志》与赵汝适《诸蕃志》又有单马令国的记载。学者考订此即为今彭亨州之关丹，汪大渊《岛夷志略》作丹马令国。宋陈元靓《岛夷杂志》、周去非《岭外代答三佛齐》与赵汝适之《诸蕃志》又有《佛罗安国》之纪录。此当为今丁加奴之龙运。赵汝适之《诸蕃志》载有蓬丰国，明茅元仪《武备志》作彭杭，何乔远《名山藏·王亨利》作彭亨，即在今之彭亨州。赵汝适之《诸蕃志》载三佛齐十五个属国中，有吉兰丹国名。《元史》作急兰亦觥，⁸《明史》作急兰丹，在今吉兰丹州。⁹赵汝适之《诸蕃志》也有登牙依国之载，《元史》作丁呵儿。¹⁰《郑和航海图》作丁加下路，汪大渊《岛夷志略》作丁家庐，《明史》、张燮《东西洋考》俱作丁机宜，《清朝文献通考》作丁加奴，在今丁加奴州。《明史》记有满刺加国事迹，此为今之马六甲。¹¹张燮《东西洋考》有柔佛之名，并沿用至今。

由上所举之各种古籍之记载，可知南洋各国与中国交往，是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的。这些记载，或者是航海者途经有关国度而加载录，如《汉书·地理志》言：“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或载写南洋国家之位置、人情习俗、物产丰富状况，如《梁书》记狼牙修国之情况云：

⁵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5271。

⁶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6306。

⁷ 《隋书》卷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页1883-1885。

⁸ 见《元史》卷二百一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页4670。

⁹ 见《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8455。

¹⁰ 同注8。

¹¹ 同注9。页8412。

“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同，偏多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吉贝为干纁。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霄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被布，以纁珞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

赵汝适《诸蕃志》写吉兰丹国之习俗云：

“风俗尚礼，男女束发，系短衫，布皂纁。每遇四时节序、生辰、婚姻之类，衣红布长衫为庆。民煮海为盐，织木棉为业。”

汪大渊《岛夷志略》写丁加庐之民风云：

“风俗尚怪，男女椎髻，穿绿绉布短衫，系遮里绢。刻木为神，杀人血和酒祭之。每水旱疫疠，祷之立应，及婚姻病丧，则卜其吉凶，亦验。”¹²

《明史》亦载云：

“丁机宜，……其国以木为城，酋所居，旁列钟鼓楼，出入乘象，以十月为岁首，性好洁，酋所食啖，皆躬自割烹。民俗类爪哇，物产悉如柔佛。”

或者写南洋各国向中国朝贡的情形，如《梁书》云：

“丹丹国，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圣王至德仁治，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谨奉送牙象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吉贝、杂香药等。”

或者写中国遣使到南洋各国，南洋各国欢迎中国使节的情形。如《隋书》载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出使赤土，赤土王欢迎中国

¹² 汪大渊著《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02。

使节的情形道：“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鱼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或者写中国与南洋各国互派使节往来的情形。如《明史》载永乐元年尹庆出使满刺加，满刺加酋长欢迎中国使节道：“永乐元年十月遣中官尹庆使其地，赐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其地无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庆至，宣示盛德及招徕之意，其酋拜里迷苏刺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三年九月至京师，帝嘉之，封为满刺加国王，赐诰印、彩布、袈衣、黄盖。”

中国与南洋各国的商业交往，相信在唐之前已经相当的繁盛。义净法师《高僧传》曾言：“义朗法师者，益州成都人也，与同州僧智岸并第一人名义玄，俱至乌雷，同附商船。”两位僧人就是跟着与南洋各国贸易的商船前往印度的。宋赵汝适《诸蕃志》言凌牙斯国“番商兴贩，用酒、米、荷池、缣绢、瓷器当为货，各以此等物准金银”，言单马令国“番商用绢伞、雨伞、荷池、缣绢、酒、米、盐、糖、瓷器、盆、钵、粗重等物，及用金银为盘盂博易”，又言佛安国“番以金、银、瓷、铁、漆器、酒、米、糖、麦博易”，反映了当时南洋各国商业的情形，也显示当时中国商人经已和南洋各国进行商业交易。之后两地的贸易交往相信越来越紧密，其后古籍记载南洋各国的情形时，都没有忽略反映南洋各国的贸易情况，如汪大渊《岛夷志略》言龙牙犀角时云：“贸易之货，土印布、八都刺布、青白花碗之属。”言丹马令国时云：“贸易之货，用甘理布、红布、青白花碗、鼓之属。”言彭坑国时云：“贸易之货，用诸色绢、婆布、铜铁器、漆磁器、鼓板之属。”言吉兰丹国时云：“货用塘头市布，占城布、青盘、花碗、红绿珠、琴阮、鼓板之属。”言丁家庐时云：“货用青白花磁器、占城布、小红绢、斗锡、酒之属。”¹³

¹³ 同上注。各则分见该书页181、79、96、99、102。

更有具体言及交易情况者，如张燮《东西洋考》言及中国商人与彭亨居民交易之情形云：“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铺其舟亦不甚远。舶上夜司更，在铺中卧者，音响辄相闻。”¹⁴ 又言及中国商人与柔佛居民交易之情况云：“柔佛地不产谷，土人时驾小舟载方物，走他国易米。道逢贾舶，因就他处为市，亦有要之入彼国者。我舟至此，都有常输，贸易只在舟中，无复铺舍。”¹⁵

不过较多华人定居南洋，则在唐代以后，此即海外华人被南洋居民称为唐人的原因。宋代陈元靓《岛夷杂志》述及佛安国有“地人并唐人迎佛六尊出殿”之语，显见“唐人”已在当地住有一段时间。元汪大渊《岛夷志略》龙牙门条尝提及当时“男女兼中国人居之”，《明史》述及马六甲之居民时，更认定华人是当地居民之一分子了。其言云：“（满刺加）男女椎髻，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淳厚，市道颇平。”张燮《东西洋考》言当时吉兰丹的情形时也说：“华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¹⁶ 可知当时华人居留南洋的数目不少。

第二节 新马华人大量移居新马的情况：兼论他们南来的原因

十七世纪之后，华人移民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数目，显著增加。葡萄牙人伊里特在1613年所画之马六甲地图中已有“中国村”和“漳州门”的地名，可知马六甲华人居民人数当不在少数。1641年，荷兰人攻陷马六甲城，当时“华人店主、工匠及农夫，约三、四百人。”1678年马六甲市区的华人居民人数为：华人男一百二十七人，女一百四十人，童子一百五十九人，男奴九十三，女奴一百三十七，童奴六十，合计七百一十六名。至1750年，马六甲华人居民的数目，更增至2,161人，占该区人口百分之二十

¹⁴ 张燮《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79-82。

¹⁵ 同上注。

¹⁶ 同注14。页59。

二强。荷兰人统治马六甲，借马六甲港口勒索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使得马六甲商业逐渐萎缩，不少华人居民逃往发展迅速的槟榔屿。在莱特(Francis Light)开埠槟榔屿之前，槟榔屿岛上已有华人居住，开埠的两个月之后，华人居民也增长迅速。1818年，华人人口增至7,858人，1860年更增至28,018人。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途径槟榔屿，其副使刘锡鸿在《英轺日记》中即说：“居民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七名，华产实十之七八焉。”1881年马建忠赴印度，路经槟榔屿，也说：“此间华商侨寓者约八万人，闽商为首，广帮次之。”新加坡在1819年开埠之后，发展也非常迅速，特别是华人人口，速度更为惊人。1821年新加坡人口总数为4,727人，华人有1,159人；1823年人口总数为10,683人，华人有3,317人；至1840年，人口总数为35,389人，华人有17,004人。到了1880年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已达八万人。

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在1826年合并为海峡殖民地后，日见繁盛的商业贸易，更吸引许多华人南来这三个地区。其情形由下表可见：

	新加坡	槟榔屿	马六甲
1860	50,043	36,222	10,039
1871	54,572	36,561	13,482
1881	86,766	67,854	19,741
1891	121,908	86,988	18,160

华人到马来亚各土邦者，主要是从事开采锡矿的工作。据英国官员韩德逊的报告：1871年雪兰莪的华籍矿工竟达一万二千人。1882年罗尔的报告也指出：吡叻太平有华籍矿工五万人，自1880年至1890年间，就有二十二万名华工涌向吡叻。

二十世纪初期，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地区华人人口之增长尤其迅速。此可由以下统计数字见出：

	新加坡	槟榔屿	马六甲
1891	121,908	86,988	18,160
1901	164,680	97,471	19,468
1911	219,577	111,738	36,094
1921	317,151	135,288	45,768
1931	418,640	176,518	65,179
1941	599,659	230,679	92,125

马来亚各土邦的情形亦然。以雪兰莪、森美兰、彭亨、吡叻而言，1911年的华族人口为433,244人，至1939年，增至953,971人；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吉打等四州的华族人口，1911年为49,386人，1939年为151,733人，柔佛的华族人口，1934年为209,167人，1939年为296,011人，增幅也不小。

以上情况，拙著《战前新马文学所反映的华工生活》曾加论析，可参照。¹⁷

在上述拙著中，也曾分析当时华人南来的原因。其一是经济窘迫。农村耕地面积的增长赶不上农村人口的膨胀，促使农村人口的失业，农村经济的艰难。而且清代的地租杂税十分苛重，造成内地农民离乡成为流离迁移的流民。闽粤一带的人民，更苦不堪言。这里山地多，可耕地少，人口密度又高。土地的压力已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更严重的是耕地多数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数农民并不拥有自己的土地。这种压力，促使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另寻生计。

干旱、饥馑等自然灾害也困扰着闽粤一带的居民：福建省(从1369年到1615年)246年间，发生29次旱灾；广东省(从1369年到1596年)227年中发生旱灾8次。至于饥馑，福建省(从1416年到1635年)219年中，发生了20次；广东省(从1390年到1626年)236年中发生了18次。

¹⁷ 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所反映的华工生活》(新加坡：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1986)，页5-7。

这种情况就造成许多人民大量外流。同时欧洲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殖民事业，大量开放殖民地的天然物资，也是促使华人南来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以锡矿来说，十九世纪末叶以前，马来亚锡矿差不多全是由华人经营，嗣后英人才注入资本，1930年后英人控制了马来亚锡矿的大部分产量，但矿场工人仍多是华人。橡胶业也是如此，十九世纪末叶还是操纵在华人手中，嗣后英人资本才加收购。不论是锡矿的开采或是树胶园的种植，都需要大量的劳工，这就是吸收华人大量南来的另一个经济因素。¹⁸

经济原因之外，社会动乱，倭寇骚扰，军阀跋扈、土匪强夺，也是造成华人南来的重要因素。远的不说，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发生连串的对外与对内战争，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乱，等等，民不聊生，反抗清廷失败的，惟恐被捕，也有逃往海外求生者。民国以后，军阀跋扈，土匪彼出此长，更使地方不靖，民心慌乱，于是为逃避地方乱事，向外迁移。或者因参与反政府抗战，不能在中国立足，因逃避逮捕的，也向外移民。

当然，十九世纪华人大量南移，也和清政府的政策有关。清政府原本是实施海禁政策的，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准许华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做工、经商。海禁既除，自然使得华人更在无后顾之忧下，放心南来。不但如此，清政府还在海外有华人寓居的地方设立领事馆，1877年底，第一个领事馆在新加坡设立。1886年起，更派遣使节团到南洋来，调查东南亚与大洋州华人的情况。

此外，南洋宗乡亲相提携，南洋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工具改善等因素也有关系。华人宗乡观念极为浓厚，南洋宗亲如有事业上的需要，常常会召引家乡的亲人与朋友参与，而在家乡的亲人，也常常因为南洋有亲友在那儿，才毅然决定抛开安土重迁的心理，远离家乡，奔赴海外。这些人士抵达南洋之后，或者在宗乡亲人处工作，或者与宗乡亲人合股经营生意，形成早期华人商业的一个特色。加上闽粤地在中国南部，地濒东海与中国

¹⁸ 同上注。

海，人民向有航海的知识与经验。因此在国内经济与政治等原因的逼迫下，闽粤人自然具有比较优越的条件向外迁移了。

新马文学作品，也有提及华人南来的因素的，如亚庸《侠姑》写女主角侠姑之所以南来，是由于兵灾的关系。¹⁹ 饶楚瑜《囚笼》则把劳工扁头七到海外归之于经济原因。他写阿七回忆来海外前母亲对他所说的一番话道：“‘阿七，田又荒，地又荒，眼见不能再活下去了！好，靠祖宗保佑，你去过番，过番去赚些钱回来安家娶媳妇！’这是十八年前扁头七将要出门时他妈对他说的话。”²⁰ 颜清湟在《新马华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地位流动(1880-1911)》文中指出：“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一时期的新马华人社会里，充满着衣着褴褛，身无一文的移民成为华丽潇洒，腰缠万贯的富翁的故事。”²¹ 这些成功的移民回返故乡，就引起乡人对南洋普遍的幻想与羡慕，从而促成南洋遍地满是黄金的传言。而一些人为招募华工到南洋工作，也鼓起不烂之舌，宣扬到南洋去的华人富有的状况。于是南洋遍地是黄金的传言乃构成许多华人南下的重要因素。浪花的《生活的锁链》就反映了当时一些南来者的这种心态。²² 一村《橡林深处》叙述亚材和他的伙计共两百多人之所以南来的原因为：“亚材同他的伙伴一批两百多人，去年才被丁大财包到南洋来做橡胶园的工作。他们在唐山时，听人家说南洋是怎么的好，怎样的可以发财，又被丁大财一般甜言蜜语说得他们心花都开了，以为南洋是个极乐世界。所以丁大财一召集起来，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两百多人。”²³ 东方丙丁的诗《当他们离开黄梨垅的时候》也写道：“从兵荒马乱的乡村里你们把锄头抛弃，/ 到红毛地界去！/ 那边是黄金铺地。/ 只为着装满这个海底一样深的肚皮，/ 那么曾把土地连带妻儿搁在一边，/ 把快乐和欢欣带进了这个虫豸满地的番边。”²⁴

¹⁹ 亚庸《侠姑》，1929年8月9日《叻报》副刊《椰林》。

²⁰ 饶楚瑜《囚笼》，1934年9月25日《星洲日报》副刊《文艺周刊》。

²¹ 见颜著《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页149-178。

²² 浪花《生活的锁链》，1930年3月21日至25日《叻报》副刊《椰林》。

²³ 一村《橡林深处》，1935年10月22日、25日、29日及11月1日《新国民日报》副刊《新野》。

²⁴ 东方丙丁《当他们离开黄梨垅的时候》，1938年3月11日《星洲日报》副刊《晨星》。